

doi:12.3969/j.issn.1672-0598.2014.06.002

论社会工作在灾后青少年家庭服务中的运用^{*}

刘斌志^{a,b}

(重庆师范大学 a 社会工作系 b 学生处,重庆 401331)

摘要:在灾后青少年家庭服务中引入社会工作,不仅可以有效地改善家庭内部的经济、互动、关系以及能力状况,更能有效地促进内在凝聚力以及外在社会支持。具体来说,社会工作介入灾后青少年家庭服务的策略包括提供适当的家庭支持服务、学校支持服务以及社区支持服务。

关键词:社会工作;灾后青少年;家庭凝聚力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14)06-0007-07

对于地震灾后青少年而言,家园重建工作不仅仅是房屋和建筑的重建,更多的是经济、家庭、心理、文化以及社会关系的重建。而根据社会调查以及文献查新的情况来看,灾后重建工作依然任重而道远。一方面是房屋重建并不等于家庭重建^[1],尤其对于儿童青少年而言,家庭经济和建筑的重建并不代表其家庭结构的修复。另一方面,对于儿童青少年而言,家庭结构的修复也难以实现原有关系和氛围的修复。有许多儿童青少年在面对收养家庭、寄养家庭以及重组后家庭的成员时,表现出较明显的退缩、内向以及抑郁等特征。可见,对于儿童青少年而言,地震所带来的家庭变迁和压力对他们具有更为深远的影响,也更需要家庭社会工作的服务。

一、地震灾后青少年的家庭变迁及压力特征

创伤事件对个体的生理和心理都会造成巨大

的负面影响,大部分的人都会有情绪或心理创伤的现象,同样也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其家庭关系,家庭功能往往陷入失衡的状态。尤其是对于汶川地震这样的巨大灾难,家庭经济、家庭结构、家庭氛围等都会受到强烈的冲击,这对儿童青少年发展的影响尤为明显。日本阪神大地震、台湾地区集集大地震等灾难事件中都有相应的研究证据表明,意想不到的重大事件对家庭生活节奏与秩序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并深刻地影响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当然,根据实地的调查结果,灾后家庭压力一方面来自地震灾害的直接影响,另一方面,许多家庭问题也是由于自身脆弱性而导致的。综合来看,地震给灾后家庭带来以下几方面的变迁和压力:

(一)家庭居住条件变迁对青少年的情况

汶川地震灾区处于四川欠发达的山区,民众

* [收稿日期]2014-03-2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09CSH039)“震后灾区青少年心理重建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

[作者简介]刘斌志(1980—),男,江西鹰潭人;重庆师范大学社会工作系副教授兼学生处副处长,主要从事青少年社会工作研究。

的居住条件本来就较差,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健全,加之地震对山区建筑的破坏性极强。因此,地震灾后许多家庭丧失了原有居住的环境。这一方面表现为原有房屋的损毁和倒塌,导致家庭成员无家可归,或者居住在危房中,具体表现为:房屋发生地基下陷和滑坡、房屋墙面裂缝、房屋倒塌损毁、房屋使用空间减少等。在地震灾区许多损毁的房屋都不能居住,这就要求家庭成员挤在帐篷房内或者活动板房内。另一方面,随着抗震救灾以及灾后重建工作的不断推进,为了解决大量受灾群众与建设用地紧缺的矛盾,灾区出现了大量规模巨大的高建筑密度活动板房过渡安置区。这些安置板房可能会存在夏季室内比室外热、冬季室内比室外冷、下雨时屋顶漏水、墙面渗水、板房隔音差、室外积水倒灌、屋内阴暗等问题。其中,活动板房夏季恶劣的室内热环境对受灾群众影响十分巨大。另外,居住环境狭小也是一个重要的不利因素。居住环境的阴暗、潮湿、闷热和狭小,使青少年没有足够的活动空间,从而影响其学业、心理和身体发展。

(二)家庭经济状况变迁对青少年的影响

汶川地震灾害中,大部分受影响的家庭经济状况都较差,有些贫困家庭甚至没有解决基本温饱问题;有些家庭经济状况较好,但由于地震对当地土地的破坏,许多从事养殖、种植产业的家庭顿时陷入经济困顿;还有些家庭的收入来源于家庭成员的外出务工,而地震灾后家庭成员都回乡参与灾后重建,因此家庭收入就相对减少,加之地震导致部分家庭成员受伤甚至残疾,看护照顾的压力也相对较大。一般来说,这些家庭经济本身存在较大的脆弱性,在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的情况下,一旦家庭成员丧失劳动力,或遭遇疾病、伤残或其他特殊意外,就容易使整个家庭陷入困境。虽然地震灾后,许多家庭都得到了各种补助,但是这些补助也存在各种问题和限制:一是部分补助的发放只在于满足其基本的生存和生活需要,在有补助的情况下仍然有许多家庭会陷入入不敷出、收支失衡、无法满足基本生活开支的困境。二是部分房屋重建的补助是基于家庭自身重建能力而发放的,由此导致那些没有任何经济能力的家

庭生活重建的压力较大,其重建步伐也会较慢。三是伴随地震灾后各种生活和生产物质成本的迅速提高,许多家庭难以承受通货膨胀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压力。四是为了应对受灾家庭由于失业而导致的家庭经济困境,政府也推行了相应的职业训练和创业贷款等政策。但对于地震灾后的家庭而言,在巨灾的心理阴影下,受灾群众很难在短期内培养出较熟练的工作技能,在灾后就业机会较少的情况下,灾后家庭的生计重建依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些家庭经济的压力,往往直接影响青少年的身心发展,这一方面表现为青少年往往自认为成为家庭的负担而陷入焦虑状态。特别是对于那些地震中受伤的青少年而言,家庭经济的困境只会使其变得更加自卑和自责,将自己变成家庭和社会的包袱。另一方面,青少年往往会为了帮助解决家庭的经济压力而辍学,过早地承担成人的社会责任。

(三)婚姻家庭关系变迁对青少年的影响

首先,是夫妻之间关系的变迁。地震后灾区的离婚率和结婚率都迅速攀升,这一方面是由于夫妻一方对另一方在地震中的表现非常失望,也有可能是有些夫妻在婚前本来就感情不和,一直由于财产分割等原因而没有离婚,而地震所导致的一无所剩,反而促使许多夫妻对人生有了更多新的看法,最终选择了离婚。另一方面是由于地震导致夫妻中某一方遇难,另一方迫于生活和生产压力而选择了重组新家庭。这些都导致了夫妻之间关系的变化,对于没有子女的夫妻而言,这种夫妻关系变化的影响仅限于两人之间。而对于那些已经有青少年子女的夫妻而言,夫妻关系的变化会给青少年带来更多负面的心理和人格的影响。特别是许多重组家庭中出现了一些新型的伦理关系,比如丈夫与亡妻的妹妹结婚、妻子与亡夫的哥哥结婚、弟弟娶兄妻或叔嫂恋等。虽然在地震后的灾区,社会大众都已经接受了这样的现实情况,但对于部分青少年而言,接受这些关系还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其次,是亲子关系的变迁。如前所述,地震灾后的青少年往往会面对着许多新的社会关系,特别是家庭重组后许多青少年将会面对新的父亲或

母亲并要学会如何处理这些新的亲子关系。对于那些处于情绪敏感期的青少年而言,地震灾后往往很难忘记亲生的父亲或母亲,并会有意无意地将继父或继母与之前的亲生父母作比较,稍有不顺心如意的地方可能就会陷入情绪的困扰当中。调查发现,重组家庭中的青少年在心理和行为上更加敏感和易怒,往往会为家庭中发生的一些小事情而产生抑郁情绪,认为在新的亲子关系中受到忽视和排斥。

再次,是手足关系的变迁。众多研究表明,手足关系是青少年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而地震灾后那些重组家庭中的青少年会更容易遇到新的手足关系,并产生一些不愿意接受的状况:一是部分青少年往往会陷入对过往逝去亲人的思念,难以融入新的重组家庭之中,从而难以与新的兄弟姊妹建立亲密关系;二是在地震灾后的心理脆弱时期,部分青少年不愿意打开自己的心门接纳新的兄弟姊妹,总认为他们会剥夺来自父母的爱,从而对手足产生敌对的情绪;三是部分青少年选择外出打工或者求学等方式,不愿意留在新组建的家庭中;四是还有部分青少年处于儿童向青少年过渡时期,尚没有自我独立生活的能力,因而会受到来自新的家庭成员的控制,难以适应新的家庭成员关系。当然,也有许多青少年能够很好地适应新的家庭生活环境,并与新的兄弟姊妹建立良好的手足关系。

最后,是隔代亲子关系的变迁。此处讲的隔代亲子关系主要是地震灾后,部分青少年由于双亲遇难而由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隔代抚养所形成的亲子关系。地震灾后,部分青少年尤其是年龄较小的青少年,往往没有独立自主生活的能力,需要依靠亲属来抚养。这部分青少年也面临着家庭关系变迁的冲击,一是需要在完全缺失父母的情况下融入一个新的家庭关系,此时青少年的心理往往会处于孤立无助的内心世界之中,哪怕亲友照顾十分细致周到,也难以弥补双亲所能够提供的亲密依恋关系,而依恋关系的缺失会造成心理上的孤独感和自卑感。二是部分青少年往往由于地震灾后遇难家属的缘故可以得到数额巨大的经济补偿。这部分青少年也有可能遇到亲属之间

由于经济和利益关系而发生的争执和冲突,从而在心理层面遭受到地震丧亲所带来的二次创伤,对于家庭关系的依恋也很难建立起来。三是在实地调研中发现,尽管隔代亲子关系的变迁会给青少年带来一些影响,但这在地震灾后的实际生活中更多地呈现为好的方面,其心理健康和社会功能状况恢复较好。

二、地震灾后青少年的家庭凝聚力特征

(一)地震灾后家庭凝聚力的相关研究

家庭凝聚力是了解家庭内部运作情况和家庭关系的重要方式,尤其对于研究家庭关系如何受到外部影响因素的改变具有重要意义。Olson、Sprenkle 与 Russell 共同发展出婚姻与家庭系统环绕模式(Circumplex Model of Marital & Family Systems)来解释家庭凝聚力、弹性以及沟通三个要素互动的过程。具体来说,婚姻与家庭系统环绕模式强调家庭凝聚力与弹性之间的平衡和趋于相等为佳,当其中任何一方太高或太低,都会影响家庭的稳定与和谐关系,此时需要通过良性的沟通来达致新的平衡。而评估家庭凝聚力的主要指标是心理的亲密程度、生活的亲密程度以及相处的时间等,具体可表现为:情感的连接、联盟、时间、空间、朋友、决策、兴趣以及休闲活动等^[2]。另外,Epstein 等人也发展出 McMaster 模式(The Master Model of Family Functioning)。此模式一方面强调了解家庭作为整体如何重视和支持其成员的活动与兴趣,另一方面强调家庭成员对彼此的投入和支持程度^[3]。除此之外,斯坦福大学的 Moos 等人也发展出家庭环境量表(Family Environment Scale, FES),试图通过家庭环境的气氛来了解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成员的成长以及家庭结构。在其中,家庭凝聚力就表述为家庭成员对家庭的关心与承诺、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协助的程度^[4]。

(二)地震灾后家庭凝聚力的变化

台湾“九·二一”集集大地震后关于家庭关系与家庭互动的研究为汶川地震灾后家庭凝聚力的变化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借鉴。陈淑惠、林耀盛、洪福建与曾旭民等的研究发现台湾“九·二一”

地震后的三、四个月内,近六成的灾区民众觉得身心健康不如从前,41.7%的人认为与配偶关系没有改变,认为变差的人有17.7%,认为变好的有32.8%,而家庭内部的亲子关系、手足关系和其他亲戚关系均未发生太大的变化,甚至变得更加亲密。可见,共同经历灾难事件,反而使得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从总体上提升了家庭的凝聚力^[5]。当然,他们的研究也发现地震灾后家庭也会存在一些成员之间的生气与猜疑、身体健康状况下降、相互隔离甚至家庭暴力等问题。结合灾后社会服务过程中对相关家庭的实地访谈资料可以发现,汶川地震灾后家庭的凝聚力变化状况可以通过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以及手足关系三个方面来体现。

首先,在夫妻关系方面呈现多样性变化特征,但总体以夫妻之间关系变得更加亲密为主,也有部分夫妻由于之前关系的疏离和隔阂而选择离婚。一方面,地震灾害给受灾家庭原有的夫妻关系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有些夫妻关系在地震灾后由于互动增加、惺惺相惜、互相珍惜、互为依靠而变得更加紧密并一直维持下去;有些夫妻在地震救援阶段由于对生命的体悟和珍惜而关系紧密,在灾后重建阶段由于各种家庭事务和经济压力而变得疏离;有些夫妻在地震之前相互之间关系不甚亲密,地震之后由于家园损毁和财产消失,关系反而变得更为疏离甚至离婚;还有些夫妻在地震之后一段时间由于子女受伤或遇难而变得关系疏离,但在灾后重建阶段由于情况的好转,重新树立对生活的希望而关系变得更加亲密。另一方面,对于部分家庭而言,其夫妻关系并没有因为地震而有所变化,家庭凝聚力之间也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

其次,在亲子关系方面,总体上表现为更为积极的互动特征。在地震灾后,父母对子女的关爱照顾与子女对父母的依恋归属之间形成较为良性的互动,最终促成更为亲密的亲子关系的形成。一方面,地震灾后家庭的亲子关系会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表现为父母对子女的心疼爱与责任心增强,在生活照顾、情感慰藉、亲子互动方面的行为会增加;相应地,一些较年长的子女会以更积

极的行为来回应父母的爱,这包括表现出更听话懂事、体贴父母的心情和情感需要并安慰父母、主动帮助父母做家务、减少外出和休闲娱乐时间、增加在家庭的时间等。另一方面,有些父母在地震灾后忙于灾害救援以及恢复重建工作,加之家庭经济状况以及工作生活的烦恼,往往忽视了子女的情感与照顾需要,甚至对子女不听话、不懂事以及较为复杂的心理问题束手无策和不耐烦,从而淡漠和疏离了亲子关系。此时,子女在灾后由于恐惧、胆怯、焦虑和孤独心理所形成的一些行为问题会增多,并给父母造成困扰,最终形成负面的亲子互动关系。除此之外,还有部分家庭的亲子关系没有什么变化,这主要是那些年龄较小的儿童所处的家庭。

最后,地震灾后家庭内部的手足关系往往会随着儿童青少年年龄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对于大部分年龄较小的儿童而言,地震灾害并未影响其相互亲密而又有冲突的亲密关系。对于那些青少年而言,由于地震带来的恐惧、失落和孤独,反而增加了青少年对于亲密手足关系的渴望程度,从而整体上提升了家庭凝聚力的水平。但是,在实地调查中也发现,许多儿童青少年的手足关系呈现出隐性和显性交叉、短期和长期交叉以及稳定性与多变性交叉的特征,这又需要进一步详细深入地研究才能厘清。

(三)地震灾后家庭凝聚力的影响因素

众多的研究成果指出影响家庭凝聚力的因素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家庭及其成员所面对的压力。Weigel等人的研究发现,家庭中面对工作的压力,尤其是妻子所受到的工作和家务压力程度会降低其对家庭的满意度和家庭整体的凝聚力^[6]。而Larson的研究也发现家庭中丈夫的失业会直接导致家庭凝聚力的降低,特别是那些妻子工作而丈夫在家的家庭^[7]。二是家庭中未成年子女的数量以及家庭中亲子关系的频数和时间。三是家庭成员尤其是夫妻之间的沟通和互动方式。四是家庭成员的人格特质,尤其是家庭成员的抑郁、焦虑以及自杀倾向往往会降低家庭的凝聚力。灾后社会服务过程中对相关家庭的实地访谈资料可以发现,汶川地震灾后对青少年家

庭凝聚力的影响因素大致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家庭经济状况。地震灾后的家庭一方面面临着财产清零、房屋损毁、工作失业等现实问题,这导致家庭顿时失去收入来源,生活陷入困顿拮据的状态,另一方面还需要面临着灾后心理创伤、照顾家庭成员、照顾伤者等现实问题。经济困难、入不敷出成为许多家庭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成为影响家庭凝聚力的主要因素。以地震中某受访家庭为例,地震后他们夫妻经常吵架,为的就是生活中的收入和消费问题、未来如何买房和安居的问题、子女照顾和教育问题以及日常开支和活动安排的问题。处于经济困境家庭中的夫妻往往会有许多心理和行为问题,女性往往表现为抑郁、焦虑或者歇斯底里,而男性则更多地表现出烦恼、不快乐、失眠和酗酒等问题。长期如此的状态,让家庭的凝聚力急剧下降。

二是居住环境状况。许多地震灾区的家庭都失去了赖以居住的房屋,有些则变成了危房。因此,许多家庭都选择入住活动板房。这种居住状况一方面导致家庭成员感受到居住环境的落差和困扰。活动板房空间狭小、空气流通差、冬冷夏热,尤其是夏天异常闷热、隔音效果很差的现实状况,让许多灾后家庭很不适应。同时,活动板房区密集、相邻过于紧密、共同的卫生和生活设施、缺乏安全保障等问题也让灾后家庭面临着多方面的生活压力,进而影响了家庭关系和凝聚力。另一方面,活动板房在温度控制、卫生条件等方面的限制也往往导致居住其中的老人和小孩容易感染各种呼吸道疾病和消化道疾病,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给灾后家庭带来了经济压力和心理困扰。

三是受灾家庭自身能力的欠缺。许多受灾家庭处于农村地区,家庭主要成员的文化素质和工作技能不高,运用和争取相应社会补助和资源的能力较差,从而降低了家庭总体的生活质量。一方面,部分受灾家庭的家长文化素质较低和专业能力缺乏的现实,影响了他们职业转换和职业获取的能力,就算是接受过政府相关的职业技能训练,也很难在短时期内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从而

降低了家庭的凝聚力。另一方面,有些家庭对于政府灾后救援和重建的各项社会政策不了解,不知道如何申请或获取相关的社会资源,不能有效地减轻家庭所面临的压力。反过来,那些获取社会资源能力较强的家庭,能够及时从政府、当地村委会、各种社会服务机构获得相关救助信息,能够通过让子女参加教育辅导、关怀照顾、心理辅导以及休闲娱乐活动,提升子女应对地震灾害的能力,减轻了父母照顾的压力。

四是受灾家庭的地震认知和态度。地震后受灾家庭对地震、对自身心理以及对生命的认知、态度和行为倾向,往往也会成为影响其家庭凝聚力的重要因素。一方面,那些认为地震是随机的自然现象,并为自身能够活下来感到幸运的家庭成员会更加幸福,并带来积极的家庭关系;另一方面,那些对生死有较乐观看法、坦然接受死亡的家庭成员能够较快地走出地震的阴影,从而有效地改善了家庭的抑郁情绪,促进家庭凝聚力的提升。另外,家庭成员对自身心理状态的敏感和适度调节也会带来更高的家庭凝聚力。

五是家庭中夫妻、亲子沟通和互动的状况。那些夫妻乐于彼此讨论、分享痛苦和快乐,并相互支持性表达的家庭更容易释放和化解消极情绪,并共同度过压力环境,维持较高的家庭凝聚力;同样,那些倾向于民主和开放的亲子关系的家庭,亲子之间的互动频率更高、效果也较好,父母和子女能够更多地从彼此获得情感支持和快乐,这也会有利于家庭凝聚力的提升。

(四)地震灾后家庭凝聚力变迁对青少年的影响

首先,家庭内部的夫妻关系对灾后青少年有重要影响。对于那些失去双亲的地震灾区的儿童青少年而言,强烈的灾害冲击和持续的关怀缺失会影响其毕生的健康发展。而对于那些依然有完整家庭的青少年而言,灾后家庭关系的变化也会影响其各方面的成长。一般来讲,那些家庭中夫妻心理没有变化或者向好的方面发展的家庭,青少年会更好克服地震所带来的心理创伤,也能够走出自我心理困境,参加各项服务活动,并有

效地发挥其复原力的作用。而那些夫妻关系变得更加疏离的家庭,青少年会更容易受到地震创伤的影响,其依恋心理没有得到有效的满足,易于陷入各种身心疾病、心理和行为问题的困境,学业发展也会受到限制。

其次,家庭内部的亲子关系成为青少年发展的关键主题。在地震灾后,青少年建立依恋关系、克服创伤心理和实现心理复原的基础乃在于与父母建立较好的亲子关系。当父母在地震灾后能够更多地向青少年表达关心、疼爱、照顾与关注时,青少年更容易在家庭、学校和同伴交往中出现积极的心理和行为特征。而当父母忽视和否认青少年的情感和照顾需要的时候,青少年更容易出现退缩、孤僻、暴力和叛逆等消极心理和行为,其学业成绩也会受到影响。因此,良好的亲子关系不但可以帮助家庭克服地震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并且可以形成父母与子女之间相互支持的良性互动。

再次,家庭内部的手足关系也会影响青少年灾后的心理应对。那些与兄弟姐妹和睦相处并能够有积极互动关系的青少年,在地震灾后更容易以积极乐观、负责任的态度参与灾后重建;而那些具有矛盾和冲突手足关系的多子女家庭,由于父母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照顾他们,青少年的心理、情感和照顾需要就很难得到满足,从而产生进一步的失落心理。另外,多子女家庭由于灾后活动板房的活动空间有限,也容易造成子女手足冲突的增加。

最后,家庭内部的沟通与互动方式也影响着灾后青少年的成长。开放、民主、平等和支持性的家庭沟通互动模式能够给予青少年更多的参与家庭事务的机会和权利,从而促进其复原力和优势的发挥,也最有利于灾后青少年的成长。而那些封闭、权威、专制和攻击性的家庭沟通模式则进一步恶化了青少年已有的消极情绪和行为问题,阻碍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可见,总体来说,家庭凝聚力水平越高,青少年获得的支持就越高,其潜能挖掘和心理复原的水平就越高,灾后心理重建的效果就越好。

三、社会工作介入灾后青少年家庭服务的策略

为了帮助青少年有效应对地震灾害所带来的创伤,社会工作的一个重要途径是提升受灾青少年所处家庭的凝聚力,并从以下几个方面满足受灾青少年及其家庭的需求:

(一)为受灾青少年提供适当的家庭支持服务

根据上面的研究发现,家庭经济状况、住房状况以及家庭沟通互动模式是影响家庭凝聚力的主要因素。那么,面向受灾青少年提供的家庭支持服务可以围绕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需要国家和政府在实施灾后救援和恢复重建的过程中特别响应受灾家庭生计发展的需求,可以以家庭为单位发放各项救灾物资和提供救助服务,对于家庭中有儿童青少年的情况要给予特别的补助;二是要在灾后恢复重建过程中,充分吸纳本地劳动力,并通过技能训练和安排非熟练工作任务的方式,帮助受灾家庭获得就业机会,提升受灾家庭的经济能力。三是要在灾后活动板房和安置房的设计过程中,充分考虑青少年成长的需要,在房屋空间设置、通风设备和私密空间布置等方面做一些适当的调整;三是要通过社会服务的方式促进灾后家庭的沟通与互动,通过开展家庭辅导训练营、家庭个案辅导室、亲子关系训练小组等方式促进灾后家庭的支持性沟通和对话,也促进青少年参与解决家庭事务,让子女共同了解问题和彼此协调,进而促进家庭内部自身力量的增长。

(二)为受灾青少年提供适当的学校支持服务

在地震灾区,青少年的家庭生活与学校生活密切相关,良好的家庭关系会带来青少年学业的成长,而学业进步和学校人际关系的和谐会带来青少年积极的心理和行为,这反过来会促进家庭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和手足关系的成长。因此,协助青少年及其家庭可以通过开展学校支持服务来达成,具体包括:一是可以以学校为单位开展灾后的社会服务工作,通过学校为青少年学生提供适当的午休场所、娱乐场所、午餐补助、助学金等,通

过学校的资助来减轻家庭的经济压力;二是可以通过学校心理咨询与辅导的方式,帮助青少年学生舒缓与化解地震所带来的心理创伤,塑造积极健康的人格特质;三是可以通过小组工作的方式面向青少年开展生命教育活动,帮助受灾青少年树立正确的灾害认知、态度和行为,同时学会理解父母、感恩父母、帮助父母,通过小组工作增强青少年的潜能开发,使他们成为家庭凝聚力提升的一般力量;四是通过学校开展各类学业辅导,解决青少年家庭在教育子女方面的压力;五是在教育课程设置中融入健康教育、心理教育、道德教育以及生命教育的内容,从根本上提升受灾青少年复原力。

(三)为受灾青少年提供适当的社区支持服务

国家支持和社会各界捐助汶川灾后恢复重建的所有经费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用于社会服务领域的。可见,增强为灾后家庭的社会服务资源分配、提升受灾家庭社会资源获取的能力以及促进社会服务的可及性,是提升灾后家庭复原力的重要方式。一方面可以为受灾家庭提供各类社会服务的信息和资源,并引导受灾家庭成员走出伤痛,融入恢复重建的各项工作之中,另一方面,还要积极促进灾后恢复重建各项社会服务工作的公平、公正和普惠性,将最紧缺的社会服务资源分配到最需要的地区和家庭。最后,还需要通过促进社会政策的改进,强化对受灾青少年权益的保护,

为受灾青少年提供心理支持、学业辅导、生活保障、休闲娱乐等多样性的服务。

[参考文献]

- [1] 邓大胜,何光喜,王东明.灾区居民心态稳定,生活满意程度较高[R].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调研报告,2010:1266.
- [2] Oslon, H. D. (2000). Circumplex model for marital and family systems [J].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22, 114-167.
- [3] 陈丽英.家庭功能的评估[J].*中华心理卫生学刊*, 1995(3):234-245.
- [4] Moos, R. H., & Moos, B. S. A typology of family social environments [J]. *Family Process*, 1976, 15 (4), 357-371.
- [5] 陈淑惠,林耀盛,洪福建,等.“九·二一”震灾受创者社会心理反应分析[J].*中大社会文化学报*, 2000 (10):34-39.
- [6] Weigel, D. J., Weigel, R. R., Berger, P. S., Cook, A. S., & DelCampo, R. Work-family conflict and the quality of family life: Specifying linking mechanisms [J]. *Family and Consumer Sciences Research Journal*, 1995(24):5-28.
- [7] 张惠芬,郭妙雪.工作与家庭[M].台北:扬智文化出版公司,1998:123.

(责任编辑:杨睿)

Application of Social Work to Adolescent Family Service after the Disaster

LIU Bin-zhi^{a,b}

(a.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b. Student Management Section,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The introduction of social work into adolescent family service after the disaster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economy, interaction, relation and capacity status inside a family but also more effectively boost its inside cohesion and outside social support, practically speaking, the strategy for social work to be introduced into the adolescent family service after the disaster includes the providing of proper family support service, school support service and community support service.

Key words: social work; the adolescent after the disaster; family cohesion